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23.07.00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对外开放论述的三重维度

刘鑫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实现了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与价值维度的高度统一。这些论述从理论维度上为逆境中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致力于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中实现共赢;从价值维度上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成果共享。落实这些重要论述要以“两个大局”为出发点,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着力于制度建设等方面,继续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

关键词: 新时代; 对外开放; 逆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23)07-0009-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1]。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悉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对外开放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这一论述在保持我国战略延续性、政策稳定性的同时,结合复杂的国际形势,把握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新举措。在逆全球化态势上扬、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回潮的当下,从理论、实践、价值3个维度上立体剖析、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对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激活世界市场新动能、激发新增长、促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理论维度: 为逆境中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专门系统地阐释对外理论,但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多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认为,全球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民族与国家保持开放,以开放促进生产力全面提升。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时代发展特征、扎

收稿日期: 2021-05-17; 修回日期: 2023-07-1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共十九大以来美国‘逆全球化’现象发展及中国应对”(2021YQNQD0070)

作者简介: 刘鑫鑫,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刘鑫鑫.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对外开放论述的三重维度[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7): 9-19.

Citation format: LIU Xinxin. Three dimens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mark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2023(7): 9-19.

根中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以坚定的信念和扎实的理论为处于逆境中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 以“两个大局”为出发点,突出对外开放的国内外联动性与全局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99}这一论述对新时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一是由内及外,有序开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频发,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使开放进入崎岖路段,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强势崛起,全球价值链竞争取代产品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福建期间就曾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3]81}我国作为工业化门类最全的国家,恰是依靠将自身发展置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通过将自身特点与价值链中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相互补充才取得了如今的伟大成就。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复兴的自身发展布局在世界历史坐标上横向定位,将中国经济置于世界布局中,将坚持开放发展、实现自身经济结构优化的国内目标同提升世界经济双向开放水平、升级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国际目标相结合,统一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专家乔治·C·乔沃曾高度评价我国的对外开放。他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改革能够成功,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4]从“关键一招”到“关键抉择”,对外开放在我国战略地位不断上升,这是我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一步。“关键抉择”背后是一系列“关键举措”,是当代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就是内外联动发展的典型例证。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昆明南站建设时曾指出,要做好互联互通的“接口”工作,做好“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在优化开放结构的同时拓展开放深度。“一带一路”倡议在发挥经济外交作用的同时,对国内起到沟通东西两个区域的发展布局、实现海陆互济的作用,对国际则是强调世界发展大格局的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067.7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58.5亿美元,同比增长6.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5亿美元,同比增长5.2%,占同期总额的18.2%,主要投向东盟国家、巴基斯坦、阿联酋、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等。中欧班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防疫物资的出口提供了宝贵的通道,2020年全年开行列车数首次突破“万列”大关^[5]，“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引领亚欧大陆焕发新的生机。

二是双向开放,形成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2]169}。这一论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开放发展认识的深化,也为持续在低位徘徊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信心。我国国土空间广阔,经济区位特征差异明显,实现内外联动以及促进不同区位之间的经济互补、国内外优势互补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布局的高度阐明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明确内外联动重要性的基础上,为内外联动开放制定了详细的规划,“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

为营、久久为功”^{[6]84},并重申对外开放的目标是“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2]199}。

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复兴置于世界的开放大局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将我国未来发展路径置于全球化的潮流中乘势而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开放布局,厚植中国经济增长行动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家开放战略,是对国内外大格局的优化,并通过政策便利化减少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同时,面对屡屡挑起贸易摩擦以及政策内顾倾向明显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外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7]114}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遭遇政府、民众两个层面上的阻力。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念,明确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8]22}习近平总书记并针对当前形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停滞做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引,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9]34},促进开放向度升级,以市场联动为起点,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总体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将始终坚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7]335}。在2022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10]这些话语表明了中国外贸创新发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开放政策创新发展、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决心。

(二) 以开放发展机制建设为核心,在升级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体现对外开放的必然性

美国学者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里总结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原因时指出,国际秩序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引发国际秩序失序。现如今的全球治理体系也是如此,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制度性变革,以更好地反映变化了的世界经济结构等力量对比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11]8}这一论断阐明了对外开放进程中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

一是升级规则,创新机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多的参与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和深度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内化国际规则,并在接轨过程中反馈修正、创新全球治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商业环境更加开放和规范”^{[7]114},在此基础上,制度性话语权是我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的客观要求与客观体现,未来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2]24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都对我国对外开放作出了详细部署,提出我们应通过开放发展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效对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努力将国内法规与国际法规接轨,依照国际经贸准则调整国内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主动学习,通过“继续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各有关国家要进

一步抓紧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要制定反映各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权重的新份额公式。要继续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要建设稳定、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联系”等^{[7]338},逐渐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与世界治理规则的差距。主动学习的过程,阐明了机制对接的重要性。共同利益是推动共同体形成的内生动力,也是维系共同体有效运转的纽带^[12]。全球治理体系内部固有制度原则与价值理念的碰撞逐渐成为达成共识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意义,提出包括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国家间将合作重心置于整合优化等具体实践措施上,展现了中国开放发展的充沛活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开放发展的信心。中国开放发展,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实际是与全球治理体系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对升级全球治理格局做出的制度性努力。

二是厘清事实,驳斥污蔑。中国对外开放制度框架自带生成性逻辑,与实践结合后将产生自我强化的特征。因此,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削弱美国,削弱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规范,从而打造“去美国化”的世界格局。产生这一想法的学者及政界人士大都未能理解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核,加之美国一贯有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假想敌”的行为,指责中国的开放是以政府干预市场,言之凿凿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谬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有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称为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这样的指责没有考虑到中国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多元包容的文化观,毫无根据且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中国的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开放,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扩张的逻辑,而是兼顾国别关注与全球理想的开放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就表达了中国对外开放在制度建设层面的意义,他指出“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13]与其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开放机制、治理体系不同,亚投行着力于打造扁平化的结构体系,着力于增加参与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表示,截至2019年11月,亚投行已有100名成员,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作为大股东,主动把资金留给其他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他国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常过程中实现脱贫,这才是多边合作的正确意义。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开放对周边国家将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反之,外溢效应也将产生回流。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站在高位的宏观规划,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创新。

二、实践维度: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升级,致力实现共赢

当前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以科技为代表的隐形资本扩张使全球发展权利有效转移,生产力的发展重构世界。面对变化的世界和个别国家领导人倒行逆施为开放带来的压力以及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4]。

(一) 以坚定的开放批判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错误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再一次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的同时^{[15]3},也承认“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

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6]151}。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表现得愈发明显。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需要我们在客观反思的基础上对全球化进行转型升级,而非一味地反对甚至逆全球化而行。

一是批驳“逆全球化”观点,深入挖掘根源。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讨论过保护关税、差别关税等问题。马克思并未直接否定或排斥保护关税,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阐明了自由贸易是世界的发展方向。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中,“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16]375}。然而近年来,全球化屡屡遭到质疑,世界经济全面性有所收缩。仔细检视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盛行的重点领域和国家地区不难发现,逆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都是发达国家,大多曾在全球化中获利。但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转换,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获利益少于以往。通过考察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较多的时间段可知,美国在其竞争能力强的产业上讲自由贸易,而在其弱的领域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现象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就业形势下进一步加剧,加之这些国家内部分配机制都有所欠缺,国内矛盾凸显。一些国家领导人将此归咎于全球化,甚至将经济上的行为扩散至政策、政治态度上。于是在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现象甚嚣尘上。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美国对中国频频发起贸易战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

面对逆全球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有些国家却“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7]273}。质言之,逆全球化的根本在于利益之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经济利益受到一定影响,而经济利益又影响发达国家领导人在其国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党选举的实质均为金钱政治,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与其身后代表的利益集团直接相关。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设置贸易障碍,限制进出口以促进国内部分企业利益回流。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最深刻的影响,引发了其内部社会分裂,将其发展乏力、社会精神凋敝的现实揭示出来。经济与政治、社会因素杂糅在一起,造成逆全球化沉渣泛起。

二是顶住压力,坚定开放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客观地正视全球化在各国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定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2]478},摒弃全球化是因噎废食的行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G20峰会上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2]473}而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言犹在耳,刚刚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美国政府又多次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同时多次发起301调查,为两国甚至世界贸易制造了诸多障碍,自由市场原则遭到重创。2020年初,英国脱欧正式生效。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的现状。同时,各自对经济主权的争夺导致多边机制运行不畅,跨境资本流量下降。

批判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构建,客观分析全球化的关键在于更好地引导和利用。历史上,中国也曾出现过妄自尊大,唯我独“中”的情形,清朝的专权与自负曾为当时的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当今的中国是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的中国,也是鼓励世界走进的中国。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2]481},画地为牢的行为终将害人害己。在2018年出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巩固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17]。简言之,面对逆全球化现象带来的逆境,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强调“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强调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以扩大战略内需为焦点和龙头,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使中西部偏远地区和后方变成“一带一路”开放的前沿阵地,提高内陆地区的开放发展水平,解决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爬坡过坎的今天,超越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狭隘观念,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启动新型工业化模式、启动新型服务贸易体系等等,同其他国家一起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建设新规则。

(二) 以实现资源统筹优化配置为目标,实现优势互补

如果时刻秉持“你弱我强,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包容普惠的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2]490},积极开展外部对接,形成合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价值链融合,深度互补发展。依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540-541}。国际依赖递增、非农业生产增长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然而,由于当前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平等加剧导致西方许多公民对中产阶级十分不满,认为中产阶级挤压了大部分公民的收入;但中产阶级却认为,经济开放才导致了他们的收入减少。在这样的死循环悖论中,贸易和全球化成为替罪羊。

事实上,资本扩张才是造成今天世界困局的制度性根源,资本逻辑导致的无限扩张,攫取超额利润剥夺市场空间,资源流动停滞导致经济不振。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家在资源配置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价值链深度融合更有利于共同发展。面对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阻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要培养贸易新业态与新模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立足亚太地区,完善价值链融合。进出口贸易千帆竞发,中国内部的东西海陆联动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布局结合,这一景象构成了区域性合作开放的新局面,在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的同时掌握了发展的主导权。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将宏观政策协调作为价值链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通过“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19]4},通过促进“各国市场、资本、技术流动”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二是搭建平台,开拓市场。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阐明“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0]548}由此可见,经济停滞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市场万能的理论被市场失灵的现实击破。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他指出“要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注重贸易平衡。”^[21]换言之,中国的开放不止于为开放而开放,而是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以双向开放打造开放新格局。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深度融合,“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近几年,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2016年达到80%,是当之无愧的主引擎”^{[22]20}。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最全的工业门类,在参与国际分工方面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新兴经济体的责任与担当。以经济走廊为代表的合作平台成果不仅有助于提高东道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收益的感知度,而且有助于为东道国经济提升“造血”功能^[23]。中国通过同新兴经济体积极展开合作,为世界经济增加新引擎,更新世界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传

统贸易,整合各国比较优势,将服务贸易作为新动力,努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三) 以区域性合作为依托,升级开放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7]298}。开放型经济需要区域合作机制保驾护航,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以加强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立足域内,互补发展。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开放的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2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强调“中国一贯主张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2]486},并指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2]100}。当前,世界购买力大幅萎缩,产业链竞争更为激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日欧经济关系等凸显出了区域性。换言之,区域分工将得到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全球分工。此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全球性挑战频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强调对全球治理体系迅速反应能力、调动能力的提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更显必要。区域性贸易安排恰符合这一需求,以“小快灵”的体量整合资源,在照顾彼此重大利益关切的基础上共商共建,以惠及周边为目标,为周边国家提供“快车”,一起奔向好日子。

二是放眼域外,积极对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延边考察时强调,延边作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窗口”,在面向东北亚开放、扩展沿边地区开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外开放实践中,诸如此类的例证比比皆是。如“一带一路”倡议贯穿欧亚大陆,国内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联系,形成国内国际区域联动的国内外一体化发展态势和格局^[25]。我国不仅以高质量共建造福东盟国家,还尽力帮拉美国家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在宏观上主推平衡发展,在微观上实现利益共赢。同时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区域性合作设计充分考虑中国崛起的地区性效应,通过高层次的战略设计将共同利益制度化。中国还多次以“金砖”之光照亮多边合作。“金砖”所夯实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承载和连接的正是超越冷战格局的价值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意义。

简言之,中国的开放不只是一种机制构建,更是思维提升,是有效破解西方主导下全球化弊端的开放,更是提升各国经济质量的贸易安排和争端协商解决机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以尊重多样性的平等为原则,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由市场关系主导的社会关系,将经济生活纳入社会网络,跳出了“支配、控制、破坏”的恶性循环,促进了周边沿线国家市场和制造业一体化。总之,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7]289}。

三、价值维度: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成果共享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26]210}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经济停滞、政治失序现象频发,全球范围内的失序常常是由不平等导致的。动荡的环境、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都是一些国家未能全力拥抱全球化的原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始终遵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中国经验置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中,以合作共赢之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为与世界各国和衷共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 以开放稳和平,为发展提供和平的现实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平的发展环境,强调“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

出发展的硕果”^{[7]356}。中国曾遭遇百年动荡,广袤的土地曾沦落为一片焦土,深知和平的大环境是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的坚固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9]57-58}在世界高度联通的今天,以开放促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

一是跨域两制界限,携手维护和平。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可概括为“战略互疑”^[27]。双方各自担心对方的发展会建立不利于己方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样的相互猜忌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无谓的损失,甚至加剧国家间分歧和局部动荡。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28]95}本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之一的资本主义却成为宰制人类的武器。为争夺稀缺资源,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文明的摧毁有目共睹。今天这种威胁依然存在,西方文明仍未能破解世界困局。

作为世界中的一员,在破解世界困局中,中国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29]5}。担当要靠合作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会见时任美国财长姆努钦时强调,中美两国要展开“有条件的合作”。“合作”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应成为“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当今的共同挑战就是发展困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之间存在着内在继承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创新。但二者间的根本矛盾并未抵消二者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一直提倡政府介入产业政策,大力建设国家银行。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一直积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降低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抗拒全球化的冲动,通过国家间长期的交往与交流互动,将世界的多样性转化为经济的互补性,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维护全球化的实践有力地消除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短期的不均衡性,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国家呈现的狭隘与极端私利,通过有效维持理性化的共商机制,促进全球认同,在自主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共赢开放与包容开放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30]。

二是反对霸权,维护新和平。与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不同,当今的霸权更多地表现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操控与垄断。霸权的兴衰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大国通过资本在全球扩张成为霸权国,政治机器随之干预市场,霸权就此体现为以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推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霸权,以实现经济全球化手段来扭曲政治的金融霸权、科技霸权等等。因此,国际分工造成的不可持续的剥夺性积累导致的霸权根源需要世界各国采取措施来共同消除。

“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19]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开放合作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充分考虑当事国生产力及其人民福祉的基础上,通过经济纽带、文化纽带、价值纽带联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大生命力提升全球化的生产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高望远,通过对历史走向、世界潮流的精准把握,剥离了在文明冲突论掩盖之下的霸权主义,积极构建新时代新秩序,在共同解决世界面临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塑造“团结力”。金砖国家应急储备金(CRA)体现的是新时代中国的大智大勇,也是新时代各国平等交往、共同抗击霸权主义的必需。

(二) 以开放促发展,使全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中,缺失最为严重的就是平等。即便有些国家一再鼓吹所谓的“平等”,全

全球化在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上的失衡也显而易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2]481}，其深刻诠释了过程平等、机会平等、成果分享平等的价值理念，而非一些国家为混淆视听所宣扬的“对等”。可以说，共赢才是对外开放的目标与价值旨归。开放是一场正和博弈，开放中的全球合作旨在让全球变得更好更安全，对弱势群体尤其如此。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辐射效应。基础设施在各国发展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易产生中国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这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知，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若与世界市场相分离，只会使其更加落后。习近平总书记因此呼吁：“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2]481}其中，基础设施就像是连接各国的桥梁。针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2]473}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31]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亚投行的工作，将资金、设备等硬件设施、联通发展经验等软件要素流向要素短缺国家，以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的方式盘活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国内要素优势。在中国的牵线搭桥下，东非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顺利开展，埃塞俄比亚的轻轨项目成功执行，秘鲁的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开放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越是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意义就越能得到充分彰显^[32]。

二是以正确的义利观引领对外开放。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是结构转型。开放作为正义的现代市场结构，是消解当前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内在张力的重要方法。资本力量必然会牵制优质资源的走向，少数欠发达地区难以触及此类资源，短期看不利于世界整体协调发展，长远看则可能对和平问题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此，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坚信，“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33]191}。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在实现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中秉持的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我们要加强对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努力把金砖国家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样板。”^[34]这一样板的力量体现的正是共享作为经济发展的“初心”，是经济全球化、开放发展的原则与保证。中国特色不代表中国独有，以中国发展推动世界发展，正是中国道路的重要世界意义。

有些国家推行逆全球化措施的噱头之一是声称全球化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而习近平总书记以广阔的执政胸怀应对世界大势的演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共享开放的论述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说法，强调在国际事务的交流中，要避免猜忌、偏见和误解，加强合作、理解和互信。

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在开放过程中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而不是利用开放机会实现本国发展，更不是以他国发展利益为代价实现本国发展。全球化是世界各国摒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共商合理有效管控分歧，通过共享实现正和博弈的过程。当前已有多个企业与国家在中国的开放中获得实惠。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发展优势集思广益，在共建过程中各施所长。甚至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局势紧张时刻，中国仍以两国人民利益为重，提出“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35]。中国的实践证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天下为公的理想，是中国对外开放在全球的价值定位。

回望历史，开放在全球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

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6]60}回首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13个经济体实现25年多的高速增长,其共同特征就是采取开放政策”^{[7]350}。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2]504}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经济作为动态循环系统,开放才是源头活水。今天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坚持对外开放,走合作共赢道路,消除壁垒、克服短视,作为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彰显中国崛起历程中自主性内在逻辑的同时,“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7]335}。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3]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4] CHOW G C. How and why China succeeded in her economic reform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3, 4(2): 117-128.
- [5] 陈红娜.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及应对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3): 1-7.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8]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0] 习近平. 共创新开繁荣的美好未来 [N]. 人民日报, 2022-11-05(2).
- [11] 习近平.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2] 王明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 [J]. *教学与研究*, 2021(5): 75-84.
- [13] 习近平.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 [N]. 人民日报, 2016-01-17(2).
- [14]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N]. 光明日报, 2020-05-24(1).
- [15] 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习近平. 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6-11(3).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9] 习近平.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1]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N]. 人民日报, 2018-08-28(1).
- [22]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3] 李向阳.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5): 51-70, 157.
- [24] 何忠国. 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J]. *红旗文稿*, 2021(8): 45-47.

- [25] 保建云.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观[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6): 110-119, 160.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27] 吴志成, 吴宇. 逆全球化的演进及其应对[J]. 红旗文稿, 2018(3): 32-34.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9]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0] 杜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彰显及整体性建设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1): 143-155.
- [31] 习近平.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32] 王公龙. 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2): 66-73.
- [33] 本书编写组. 新时代新理论新征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4] 习近平. 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7-26(2).
- [35] 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N]. 光明日报, 2018-05-20(2).
-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Three dimens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mark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LIU Xinxin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mark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achieved a high degree of unity in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value dimensions. These remarks provide a Chinese solution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adversity from a theoretical dimension, committed to achieving win-win outcomes through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y als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promote the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from the value dimension. To implement these important remark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the goal, focus on system building and other aspects, and continue to expand China's opening up.

Key words: new era;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ti-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温 然)